

| 陈 | 鼓 | 应 | 著 | 作 | 集 |

春蚕吐丝

殷海光最后的话语

陈鼓应 编

中华书局

| 陈 | 鼓 | 应 | 著 | 作 | 集 |

春蚕吐丝——

殷海光最后的话语

陈鼓应 编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陈鼓应编. —北京:中华书局, 2019.3

(陈鼓应著作集)

ISBN 978-7-101-13699-9

I.春… II.陈… III.殷海光(1919~1969)-哲学思想-文集
IV.B2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04875 号

-
- | | |
|-------|---|
| 书 名 | 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 |
| 编 者 | 陈鼓应 |
| 丛 书 名 | 陈鼓应著作集 |
| 责任编辑 | 王 璇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
| 版 次 | 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920×1250 毫米 1/32
印张 9 $\frac{7}{8}$ 插页 4 字数 190 千字 |
| 印 数 | 1-5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3699-9 |
| 定 价 | 58.00 元 |
-

纪念殷海光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和逝世五十周年



殷海光



雷震、陈鼓应、王晓波（从右到左）在台北景美陈鼓应的家中

《陈鼓应著作集》总序

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园中度过，这期间，两岸历经对立与交流的种种曲折。我的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亦颇多波折，两者交互抵触，有时又能相互彰显——现实人生的坎坷，常使学术路途中断，但我“困”而知之，不断激发求知的动能，进而丰富着我的学术人生。

我的著述主要分两类：一是学术专著，二是时感性的文章。后者将以《鼓应文存》为名，另外编成一个系列，包括《失落的自我》、《言论广场》、《台大哲学系事件》、《走进白色恐怖》、《台湾民主运动脚步》等著作。这一系列反映着我所处的境遇与时代的路痕。

我的专业著作，主要集中在道家各派及三玄四典的研究。《悲剧哲学家尼采》是我的第一本书，这本小书奠定了我学术的

基础,接着是《庄子浅说》,用力较深的则是费时多年的《庄子今注今译》。可以说,从尼采到庄子,是我学术路程的一条主线。借着他们,我将现实关怀与学术人生联系在一起。

二

大学期间,受先师方东美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影响,我体会到,如果不能了解一个民族的灾难,也就不能理解这个民族文化的深层底蕴。个体生命也是如此,正如叔本华所说:“一定的忧愁、痛苦或烦恼,对每个人都是时时必需的。一艘船如果没有压舱物,便不会稳定,不能朝着目的地一直前进。”我的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就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下并行演进着,恰恰体现了老子祸福相依的哲理。

中青年期间,我常处于逆境中,尼采的冲创意志和庄子在“困苦”中保持定力与超越的心境,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激励着我迎难而上,永葆生命的昂扬气概。

台湾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白色恐怖,我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著作反映了我内心对于自由民主的渴望。到了七八十年代,我在文献和学术论著方面打下基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那段时空中,我虽然经受着现实环境的冲击,却还能积极地参与学术、文化上的反思。透过古籍文献的整理与诠释,我不仅得到传统人文思想的熏陶,还表达了对极端化与绝对化的神权思想的反感,阐发了对威权体制下的人身崇拜和造神运动的批判。这一时期,我以尼采和庄子为主的论著,都反映了“任其性命之情”的倾向。接下来,《道家的人文精神》和《庄子人性论》两书的内容,

又可以说是“安其性命之情”的展现。

三

《陈鼓应著作集》共二十本，它们分别在海峡两岸不同的时空中写成。有关尼采哲学和存在主义的介绍以及老、庄的注译，都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台大校园里完成的。1973年春夏，因为参与台大校园内的保钓运动、发表时论，我和王晓波在“台大哲学系”事件中首遭整肃。自此以后，我的学术人生被迫中断十余年，直到1984年才在北京大学重启学术生涯。

在北大哲学系执教期间，我除了陆续完成道家各派典籍的诠释，也针对当时大陆学界的研究现状，着力于围绕以下三个议题表达不同的观点，并在《哲学研究》等刊物上陆续发表相关论作：第一是中国哲学开端的议题；第二是《易传》的学派归属问题；第三是理学开山祖的问题。这三个重要的议题构成了我的《道家哲学主干说》的中心议题，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本学术专著。

“9·11事件”之后，整个世界更加动荡不安，就像司马迁所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也像泰戈尔《演讲集》中对西方思维方式的描述：“西方人习惯于按照人们所归属的半球不同，而将人类世界断然划分为好的和坏的。这种傲慢的分裂精神严重地伤害了我们，给我国自己的文化世界造成巨大危害。”事实上，战争与冲突的根源多在于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为此，我更愿意站在地球村的视角思考问题。中国哲学儒、墨、道、法各家，传承数千年而蕴涵着中国文化的内涵，各有其普世的价值。这种普世价值，是指在人文精神的照耀下，老、孔、墨、庄的思想都散发出普世

的情怀,即老子的贵柔及其宽容心态、孔子的恕道及其家庭伦理、墨子的兼爱与非攻思想、庄子的艺术人生和齐物精神。

四

我们这一代都在内忧外患中度过重重的困境,我生长在动荡时代的福建客家山区。从我有记忆开始,日本军机就在我的家乡频繁轰炸,导致平民死伤无数,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象。

由于长时期目击了强权带给人类灾难的战争,逃难、流离、思乡之情始终扰动在我的生命中。然而,尼采的酒神精神、日神精神和《庄子》的“任其性命之情”、“安其性命之情”的洒脱心境,却赋予了我困境中思索与写作的动力,使我能够在尼采的思想中,寻找到精神的家园,在《庄子》的天地中,寻找到心灵的故乡。

五

台大校园和北大校园是我这一生学术活动的中心点。我从台大哲学系退休之后,晚年又重返北大哲学系任教,有赖于北大哲学系主任王博教授的邀约和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鹏程瀚宇公司孙宝良总经理帮我安顿入住到北大中关村新园寓所,使我有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可以安心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一套著作集系列的筹划和出版,是由北京中华书局顾青总编辑积极促成的。对于上述诸位的雅情高谊,我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除了少数的几部书稿,著作集中的大部分书稿都曾在两岸出版过,此次汇编再版,都以最新或经过修订

的本子作底本排版;除了少数几部新作外,凡旧稿中的前言或序言皆一仍其旧,予以保留,不再另行撰写。

陈鼓应

2015年4月21日

于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时年八十

出版说明

陈鼓应

—

2016年是先师殷海光先生(1919—1969)被迫离开他所挚爱的台湾大学五十周年。从1966年开始,到因病去世,是他的晚年时期,也是我与他交往最为密切的一个阶段。在他去世的当年,我编印了《春蚕吐丝——殷海光最后的话语》,首次披露了老师的“病中遗言”与“病中语录”,还有他的一批珍贵书信。因为其间涉及他的晚年境遇以及思想转变,所以这批材料历来受到各界关注。不过,由于当时编印仓促,加之“白色恐怖”的政治环境,也留下了不少遗憾,并且造成了一些误解。日后,此书虽然再版,但除去增补了部分内容,却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修订。现在,借“陈鼓应著作集”在中华书局陆续推出之际,我决定将本书纳入其中,进行全面增订。

二

因为《殷海光全集》已经在台大出版中心出版,所以此次修订,对于《全集》中已经收录的部分,包括师母夏君璐先生的文章,大都割爱。只对两类进入《全集》的内容,做了保留:一是原本就由本书首次发表的殷先生的文字,二是与殷先生生平——特别是晚年境遇直接相关的文字。而增补的内容,包括殷先生的遗稿——《我对中国哲学的看法》,还有几篇殷先生的朋友与学生追忆他的文章。由于本书主要记录与呈现的是殷先生的晚年思想,所以此次特地编辑了《殷海光先生晚年纪事年表》,作为参考。另外,我新近完成的长文《追忆殷海光先生的晚年境遇》介绍了一些殷先生晚年不为人知的史实,并且澄清了一些长期以来的误解,是故用作本书的代序。

三

此次增订,历时半年,先后在北京、台北与柏克莱等地搜集相关资料,在核对史实与征求版权时,得到了诸多旧雨新知的支持。同时,也全程得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浴洋的帮助。我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2016年5月于北京大学道家研究中心

追忆殷海光先生的晚年境遇(代序)

陈鼓应

引言

1956年,我考进台湾大学中文系,第二年转入哲学系。大一的时候,我选修了殷海光先生的逻辑课。大二时,我又选了方东美先生的中国哲学史。那时期,当代西方出现两派对立的思潮——逻辑实证论与存在主义,刚刚同时传进台湾的大学校园。殷先生倡导的是科学主义的逻辑实证论,我和一些喜欢文学性哲学的同学则比较喜欢存在主义。由于偏好的不同,因而在哲学专业上,我渐渐地跟随了方先生的方向。研究所期间,方先生是我撰写尼采硕士论文的指导教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两位老师在我的学术人生与现实人生上都产生了毕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倡导逻辑之外,殷先生还是一位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启蒙教育家,他的兴趣时常跨越出专业范围。在课堂上,同学们体

会到殷先生更多的心思是放在运用逻辑推论分析时政上。他那清晰而低沉的语调,常使人感受到他内心深处不时流露出的关切现实人生的情怀。那时的我们并不知道殷先生 1948 年 11 月 4 日曾经在南京的《中央日报》上发表过社论《赶快收拾人心》。——这篇震撼大江南北舆论界的文章问世不久后,殷先生便东渡到了台湾。

1947 年,时任《中央日报》主笔的殷先生曾获洪谦教授引介到金陵大学教书,讲授哲学概论和逻辑的课程。(这件事情,是 1985 年我到北大任教时访问外哲所长洪谦先生,他亲口讲述给我的。洪先生曾经是西南联大教授,也是维也纳学派唯一的中国成员。)1949 年殷先生赴台,又经熊十力先生向方东美先生推荐到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熊先生在 1949 年 6 月 16 日致信殷先生,说“方东美先生来信,云汝事曾有人向校长推荐过,委实无缺,俟将来留意”云云。不过殷先生最终还是得以进入台大哲学系。(这件事是殷先生亲口告诉我同班同学赵天仪的,殷先生对他说:“那时我带着熊先生的信去看方先生,方先生说你能担任讲师,副教授再说吧。”为此我特意回校查过,方先生在台大出任系主任的任期为 1948 年 8 月至 1950 年 2 月,而殷先生的聘任正是方先生接任系主任期间。)

殷先生 1954 年升为副教授,1957 年升任教授。他在这一时期沉浸在自己的专业研究中。我们每一次去看他,都是他亲自开门,小小的客厅里有很大的书架,上面全都是英文版的专业哲学论著。(殷先生过世后,殷师母清理他的书籍共九百一十本,其中西书占七百五十五本,后全部放在台大图书馆特藏室。)

自1948年发表了《赶快收拾人心》这篇社论以后,殷先生沉寂了近十年。1957年8月1日,沉思多年的他,忽然在《自由中国》第十七期的社论上发表《反攻大陆问题》,这篇文章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官方与极右派调动报刊、电台等多种媒体制造舆论,连续发动猛烈攻击。官方认为这篇社论是在倡导“反攻无望论”。在这种形势下,胡适出来打圆场,提出“反攻大陆”是一块金字招牌,是不能碰的。这以后,殷先生连续以社论的形式发表了《政治神经衰弱症》(1958年6月16日)、《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1959年4月1日)、《“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1960年5月16日)。这些文章在我们年轻人中间引起了极大的共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殷先生的言论激荡人心,他划时代地、阶段性地取代了胡适在台湾的影响力。在那“沉默是金”的年代里,这样的言论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当然,也构成了殷先生日后被迫离开台大的根本原因。

殷先生的学生中有很多优秀的、有时代感的文法科学生以及港澳侨生,在台湾就读的港澳学生在当时扮演了从民间沟通两岸的重要角色,殷先生晚年经常托他们传递信息、购买海外书籍。

严格来说,我只是殷先生的学生,而非他的弟子。殷先生倡导逻辑、知识论和科学哲学,师兄罗业宏、刘福增,学弟林昭田、何秀煌等,在专业上走殷先生的道路,有不少殷门弟子在大学毕业后陆续前往北美留学,殷先生晚年病困时,他们多不在身边,殷先生也就更多地和我们这些留下的学生相往来。我们不仅与殷先生共同经历了他人生中的一些重要时刻,有些需要跑动的事情我们也参与其间。比如,殷先生晚年的一些紧要信件,有些是由我

通过友人吴大中悄悄带出境外的。

在殷先生的海外通信中,最为著名的便是他给林毓生和张灏的信。师兄林毓生、张灏与殷先生的关系十分密切,无论讨论学问,还是沟通感情,他们与殷先生之间的交往,已是大家所熟知的了。殷先生晚年,我们的联系较多,最初的单独接触就是从一起谈论存在主义、庄子等话题开始的。

一、师生谈论存在主义与《庄子》的读书心得

大学期间,逻辑和哲学概论是我们的必修课程,我上了殷先生的逻辑课,对比之下,远比上哲学概论收获大得多。逻辑虽不是我的兴趣所在,但在研究所毕业,各校兼课的那几年,我也曾前后五六年教授逻辑。从学逻辑到教逻辑,这一过程对我日后思考问题、论述学理,确实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相比于概念性哲学,我个人更钟情于文学性的哲学。我和殷先生偶尔见面交谈时,也并不曾以逻辑作为话题。课堂以外,我们师生私下的接触开始于我读研究所时。研究所一年级的時候,哲学会举办了一个讲座,在存在主义思潮的激荡下,我讲了《失落的自我》这个题目。当晚,殷先生也到教室听了讲座。第二天,我又在研究室门口遇见他,他问我是不是研究尼采的,我说是,因为我喜欢尼采那股生命的冲创力。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生命的冲创力”,他便在研究室听我漫谈起了对于尼采的一些看法。临走时,还抄了几本有关尼采的书单。这是我和殷先生的第一次单独谈话。

我由尼采的生命哲学走进欧美存在主义思潮是很妥当的事。